

臺灣工業發展與社會福利之歷史結構分析

王 方

壹、前言

本文以 Skocpol(1992)之歷史結構分析法，對經濟、工業發展與社會福利之關係，提出初步的探討，本研究認為國家中心論對臺灣的社會福利有相當的解釋力，工業發展模式對社會福利有特殊的影響，本文並對失業保險之發展加以分析，最後並對未來的展望提出一些討論。

貳、經濟、工業發展與社會福利

經濟、工業發展究竟與社會福利有何關係呢？不同的理論有不

同的看法。以工業主義邏輯（Logic of Industrialism）來看，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是影響社會福利的主要因素。當經濟越進步，社會福利也應會發展得越好，花於社會福利的經費也應該會越多。隨著經濟發展，各國可能走上相似的方向（Wilensky, 1958 & 1975）。此理論假設社會福利有助於工業社會維持經濟與社會的均衡（Pampel & Williamson, 1989）。部分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或工業化對臺灣的社會福利發展，有相當的解釋力（如：Chan, 1979；彭懷真，一九八三）。有研究則提出不同的看法（如 Lin, 1991）。其實在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制定過程中，國家機關或權力精英可能透過對政治制度、社會價值觀或程序的操縱方法，而將政策議題範圍侷限在對其有利與安全之處。例如，臺灣過去多將其社會福利集中在有利生產的健康保險上，而對失業保險、老年與非勞動人口的保障則較少關注。工業主義邏輯不能充分解釋為何美國的工業化發展程度高，但其社會福利發展卻落後部分歐洲國家。有些學者乃以文化決定論（Culture Determinism）來解釋美國的異例。根據文化決定論，雖然工業化和

經濟發展有利於各國發展社會福利，然而各國的國家價值觀與文化對其社會福利發展仍有重要的影響。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美國文化較有自由主義色彩，因而較不傾向由國家提供大規模的制度性社會福利（Gronbjerg, Street and Suttles, 1978; Orloff and Skocpol, 1984; Zijderfeld, 1986）。

馬克思學派對經濟與福利的關係（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有不同的看法，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國家機關的主要在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國家機關為資本家所控制（Carnoy, 1984）。部分新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國家機關未必受到資本家的直接控制（Poulantzas, 1978）。新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機關要表現兩種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功能：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與正當化（legitimization）（O'Connor, 1973）。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要促進經濟發展以累積資本，一方面則可能需要透過社會福利政策來換取人民的支持，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政權的正當性。另有研究指出：資本主義必須為經濟的成長而維持勞動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但在此同時又必須對勞動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以減少對私有市場的傷害，形成有些矛盾的情形。（Offe, 1984; Pampel & Williamson, 1989）。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在生產過程中變成商品一般受支配，而形成勞動的商品化，而「去商品化」則可使勞工不致淪為市場上的商品一般的命運。不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較缺少明確可驗證的命題，顯得比較抽象。新馬克思主義還可能有套套邏輯（tatulogy）的問題（Pampel & Williamson, 1989）。

正如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Approach）所說的，國家機關本身可能對社會福利產生重要的影響，國家機關的特徵、傳承與領導精英都會影響社會福利的發展（Orloff and Skocpol, 1984; Skocpol, 1992）。過去的研究指出，國家領導精英的意識型態對臺灣的社會福利發展有重大的影響（Tsai & Chang, 1985）。在臺灣經濟發展政策規劃中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李國鼎先生，在一場國際研討會中曾提出其對發展社會福利之四項看法：個人享有的社會福利權，應與個人所盡的責任相當；社會福利制度不應取代家庭的社會功能；社會福利措施不應傷害自由市場的運作；社會福利應為家庭、企業與政府三位一體的共同運作制度（詹火生，一九八七）。李國鼎先生的論點相當程度地代表了當年國家精英的意識型態，主要強調工作倫理、工作價值、自由市場、家庭與企業的角色。王方（二〇〇〇）曾以發展社會學的角度比較東亞與拉丁美洲的社會福利經驗，而非聚焦於臺灣，以往對臺灣工業發展與社會福利的關係，仍研究不足，本文試圖做一些努力。

參、傳統的出口導向工業發展模式

所謂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可簡單區分為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zation）及出口導向工業化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過去，基於日本殖民時建立的基礎與美國的援助，臺灣曾在戰後短暫的採用進口替代工業化，由於國內市場狹小，而美國援助政策又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發生變化，使其發展策略逐步轉變為出口導向工業化 (Gold, 1986)。

臺灣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帶動了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不同於工業主義邏輯所預期的，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未必成正比。正如新國際分工論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所指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特性，應從所謂國際分工的脈絡中來理解 (Frobel, Heinrichs and Kreye, 1980)。對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成長與國際資本對廉價勞工的需求，都將促使其試圖降低勞動成本，培養廉價溫馴的勞工，以強化國際競爭力。同時，對勞工權利與工會活動也會傾向壓抑，在此情形之下，其對社會福利與勞工福利也會有所限制。外銷導向的工業發展，使臺灣較重視國際競爭力，在天然資源缺乏而高科技又不如已開發國家的情況下，臺灣傾向培育廉價、溫馴而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以加強國際競爭力。臺灣的外銷導向工業發展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影響：首先是限制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為了避免社會福利增加企業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臺灣過去對社會福利較傾向壓抑，而且以往傾向將社會福利集中於健康保險，因健康保險主要針對勞動者的健康，有助於維持穩定優良的勞動力。至於對於保障失業勞工的失業保險制度，則發展甚晚。另一方面，如 Deyo (1989) 所言，在臺灣出口導向工業化形成的工業結構，對於勞工運動與工會活動是不利的，勞工不容

易發動集體行動來爭取福利權益，這對其社會福利的發展亦有不利的影响。Stephens (1979) 指出社會福利是勞工力量成長的產物，Korpi & Shalev (1980) 指出工人階級的成長與動員，其產生有利於勞工階級的福利制度，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工業發展的是臺灣傳統的領導精英價值觀。西方的研究顯示，社會福利的相關意識型態可以區分為社會公平 (social equality) 與經濟個人主義 (economic individualism)。社會公平意識型態認為政府有責任保障國民基本的生活，國家干預是有助於改善社會不公的重要方法 (Feldman, 1983; Hasenfeld and Rafferty, 1989; Kluegel and Smith, 1983)。經濟個人主義則比較重視工作倫理，認為社會福利可能造成窮人的依賴性及惰性 (Bobo, 1991; Friedman and Friedman 1980; Gilder, 1980)。由前述李國鼎先生的談話來看，臺灣傳統的領導精英意識型態，似有部分經濟個人主義的色彩，而與社會公平意識型態有相當的距離 (註一)。

另一方面，與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臺灣的國家精英對全國經濟發展更為重視。其意識型態傾向經濟發展優先，經濟成長掛帥。以往的研究指出，發展落後的國家之工業化常帶有快速迎頭趕上的本質，為了快速的進行資本積累，尤其當其感受到較大的危機與威脅之時，國家機關通常會積極介入發展較晚發展的國家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其國家機關通常比早發展的國家 (early-developing countries)，扮演更積極更強勢的角色 (Gerschenkron, 1962)。臺灣傳統之經濟成長掛帥意識型態強化了

經濟發展的工具理性，同時對領導精英視為可能有礙於國家經濟發展之社會需求，也傾向於壓抑。

肆、失業保險之發展

領導精英經濟優先的價值觀，加上外銷導向工業化對降低生產勞動成本的重視，使政府在規劃社會福利時，多以工作動機等因素為主要考慮，部分福利方案因而一直是停在宣示的功能，直到近年才突破。工業主義邏輯假定，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是影響社會福利的主因。經濟越進步，社會福利也會發展得越好，各國隨著經濟發展可能走上相似的方向。然而實際上，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國家機關與領導精英可能將政策議題侷限在其希望的範圍中。國家機關與領導精英之意識型態可能會明顯的影響社會福利發展的方向，例如，臺灣過去有很多年將社會福利集中在有利於生產的健康保險上，而對失業保險則較少關注。勞保等保險數十年前早就開辦，然而失業保險則遲至近幾年才開始推行，比全民健保的發展還要晚。

先進國家如英國（一九一一年）、德國（一九二七年）、美國（一九三五年）、日本（一九四七年）都早在數十年前即開始實施失業保險。我國失業保險曾研議多年，但一直未能真正付諸施行，其成因相當複雜。失業保險基本上是一種「在職」（in-service）的社會保險，

主要在保障有工作能力的被保險人在遭遇非自願性失業，而未獲適當工作之前，得以依法領取失業給付，以維持其生活並促使其得以再就業。政府長年來經濟優先的傾向，強調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加上外銷導向工業化高度重視國際競爭力，使政府傾向壓抑社會福利以降低成本。因此政府在規劃社會福利時，多以工作動機與經濟因素為主要考量，較少重視社會福利之「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功能，忽略社會福利的「去商品化」功能正在使勞動者減少對薪資的依賴，而不致淪為市場上的商品。健康保險有助於使生病的勞動者早日返回工作，有利於生產，然而失業保險是否會影響失業者的求職意願與一般勞動者的敬業精神，失業給付是否又會提高失業者心中的保留工資，而延長了勞工的失業期間，一直都引起爭議。再加上國內缺乏強大的階級政黨，省籍、統獨等因素所構成的特殊環境，使得弱勢團體的利益，一直不是政黨競爭的焦點問題。

在此情況下，過去的社會福利往往侷限在有利於生產勞動力的健保項目，至於去商品化程度較高的福利政策往往只流於政策宣示。政策宣示的目的似在顯示政府有意照顧弱勢，以吸引民眾的支持，但實際上卻常是一拖再拖，久久不落實，失業保險即是一例。有趣的是，早在九十年前，政府即曾不斷的對失業保險問題發表政策性的宣示，行政部門雖不斷的代表應辦理失業保險，結果卻一拖再拖。舉例來說，民國十三（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即曾宣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一九二六年之國

民黨政綱中，更進一步的強調工人失業保險的意義。一九四五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政綱，再次強調失業保險的重要性。一九五一年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又一次強調，勞工保險的範圍應包含失業。同一時期的「大陸收復時期工人運動指導綱要」也指出應當擴大勞工之失業保險。一九五八年勞保條例完成立法時，立法院甚至曾決議請行政院於「最短期間」內對失業保險完成立法，然而實際上進展極緩，立法院在修正的勞保條例中增列失業為勞工保險的保險項目之一，然而依然沒有什麼進展。一九六九年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現階段社會建設綱領」，又再次的強調失業保險之意義。一九八七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成立，草擬並修正失業保險的實施辦法向行政院提出，仍然進展有限，一九九一年行政院曾表示：待全民健保實施後，再談失業保險。一九九六年又表示國民年金開辦後，再談失業保險。直到近幾年，失業保險才真正有所突破。政黨競爭的逐趨激烈、失業與經濟問題的日益嚴重、勞工抗爭的升高，應都是失業保險與就業保險（註二）終於得以突破的原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刺激就業意願，失業勞工在領取失業給付以外，另可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倘若失業勞工得以提早就業，還能領取提前就業獎助津貼。可以看出，工作動機與促進經濟發展仍是就業保險法背後重要的考量。

伍、結語與展望

本文指出國家中心論對臺灣的社會福利有相當的解釋力，工業發展模式對社會福利有其特殊的影響。對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成長與國際資本對廉價勞工的需求，都將促使其壓抑勞工權利與社會福利，降低勞動成本，培養溫馴的勞工，以強化國際競爭力，在此情形下，社會福利自會受限。伴隨工業發展的臺灣傳統的領導精英價值觀，更進一步的強化了此種情形。

隨著產業經濟與社會政治結構的變遷，今後一些與社會福利有關的現象值得特別注意。

一、在發展策略方面，臺灣雖逐步進行技術升級，加強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工業，然而基於以下原因，其社會福利之發展仍然有限：首先，臺灣即使技術升等，仍極重視國際市場與國際競爭力。再者，臺灣的國家機關仍有相當強的發展取向與發展承諾，經濟掛帥的取向仍強。另一方面，缺乏歐洲的強大工人階級政黨，臺灣缺少專門為勞工與弱勢團體爭取福利的政黨。

二、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發展可能會強化了社會福利所造成的反饋（feedback）作用，由於任何社會福利政策之推行或改變，都可能影響利益團體的變化或促使潛在受益者集結成新的利益團體。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可能加速利益團體的變化，這類利益團體可能會再影響社會結構，並進一步影響未來福利政策的發展。社會福利政策不只受到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社會福利又會反過頭來重新塑造政治與社會結構（Hochman & Williamson, 1995; Pratt, 1993; Skocpol, 1992）。

三、城鄉臍帶的鬆弛與「二代勞工」的成形。過去的研究顯示，臺灣早期的勞工常與農村保持聯繫，當其在都市的工廠受挫之時，或是農忙之時，往往返回農村工作。然而隨著產業與社會結構之變遷，以大都市（如臺北市）為安身立命之處的二代勞工已日益增加，這些二代勞工與農業區的臍帶已相當鬆弛，都市的工作是其生存之唯一憑藉，因而其階級意識遠比第一代勞工強，其對勞工福利之態度也遠比第一代勞工複雜。隨著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工業的推展，都市勞工的異動率逐步下降，更有助於勞工階級意識的形成與集體行動的採行。在此情形下，欲以簡單的勞工福利來安撫攏絡勞工，恐不易如願。

四、使弱勢團體之間的利害關係更形複雜。福利政策的目的之一本在扶持嘉惠弱勢團體，減少社會不公。然而產業與社會結構變遷卻往往使弱勢團體立場分歧。例如，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外勞與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之勞工，皆可算是勞工中之弱勢族群，然而其利益未必一致。保障其中任一族群，未必會得到其他弱勢族群之支持。另一方面，對弱勢團體的特別保障，又可能引起其他團體之反彈，社會福利的日趨複雜，由此可以看出。以往有關弱勢團體政策的制定，通常是根據強勢團體如何界定弱勢團體的困境而定，而缺少對弱勢團體本身意見的了解，因而不易弄清楚這些弱勢團體真正的問題所在，以及究竟如何處理才最為有效。可惜的是，除了少數的例外，過去對民眾福利態度的研究相當有限（王方，二〇〇一；林萬億，一九九五；傅立葉，一九九四）。

五、加劇了不同階級間利益之矛盾與政府角色之左右為難：正如前面所言，現代政府需要同時履行兩項重要而相互矛盾之功能——資本積累與正當性，前者又涉及到自由原則，因為資本積累主要依靠資本家間的自由競爭，政治正當性則涉及到民主原則，因為政治正當性主要依靠勞工與一般大眾對政府的選票支持。問題是，資本家與勞工階級對勞工福利之立場往往是歧異甚至是對立的。這從資本家／企業界與勞工對全民健保負擔比例問題之爭議可以充分看出。政府的左右為難在於一方面要爭取勞工大眾的支持與選票，一方面又需要資本家與企業界履行其功能。另外，如前述，弱勢團體之間，也往往有利害衝突。對某一弱勢團體有利的政策，可能為另一弱勢團體所反對。林忠正（一九八九）與個人（Wang, 1994）的研究，皆有類似的論點。最後，隨著電腦業的進步與新工作方式的出現，福利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高教育程度的電傳勞動者（teleworkers）也可能有缺乏福利保障的情形（註三），福利政策面臨更大的挑戰（王方，二〇〇二）。

（本文作者現任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助理教授兼社會組主任）

◎ 註釋：

註一：林萬億（一九九五）發現，中國人除了此兩種福利意識型態之外，還有所謂的「傳統慈善」意識型態。傳統慈善意識型態與經濟個人主義皆不贊同制度性的社會福利，不過，傳統

慈善意識型態並未將個人的成就與其缺陷緊緊相扣，此與經濟個人主義不同。王方（二〇〇一）發現，傳統慈善意識型態對民眾的福利態度並不如另二種意識型態顯著

註二：就業保險法之立法主旨在於將失業保險單獨立法，同時將較消極的失業救助，改為比較積極的就業促進。當勞工遭遇非自願性失業的時候，可以獲得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與健保費補助等，以維持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並刺激其儘快再就業。就業保險得以通過的原因之一，應是因應國內近年來嚴重的失業問題與經濟不景氣。

註三：所謂的電傳勞動（telework），是指「運用電子通訊技術與雇主或同仁聯繫，藉以溝通與傳輸工作成果之勞動方式，而其工作位置通常在雇主之主要營業場所之外或與委託人所在地點分離」（王方，二〇〇二：一五九）。這可說是工業高速發展下而產生的新工作型態，這種新工作型態有可能突破了固定雇主、固定工作時間與固定地點等傳統的限制，因而可能使得社會保障的許多面向受到衝擊，部分電傳勞動者甚至可能沒有取得傳統的勞工身分。如果沒有取得傳統的受雇勞工身分，通常與雇主缺乏正式的雇傭關係，也可能缺乏一般的法定企業福利（如退休金、資遣費、社會保險）。我國目前勞動及福利相關法規對勞工福利的保障，主要是針對具有傳統受雇勞工身分的人，未必能充分保障所有的電傳勞動者。部分的電傳勞動者可能被公司界定為臨時性的或是自雇勞動

者，以承攬關係提供服務，因而未能充分得到傳統的勞工福利。雖然傳統勞工也可能被企業界定為非正式或外包人員，然而以往的工作方式，通常是集中於固定之時間與地點為固定的雇主效勞，其被界定為外包人員之機會畢竟較少。由於電傳勞動者常常運用電子通訊技術，故教育程度往往比一般勞工高，然而未必能享有傳統高學歷白領工作者的保障（詳見王方，二〇〇二）。

◎ 主要參考文獻：

王方（二〇〇〇）。發展、勞動與福利：東亞與拉丁美洲經驗的省思，發表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係與勞工政策」學術研討會，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香港：城市大學。

王方（二〇〇一）。臺灣民眾社會福利態度之決定因素初探，東吳社會學報一一：一三七—一六二。

王方（二〇〇二）。「電傳勞動」對福利的影響：新工作型態對勞工福利帶來的省思，臺灣社會福利學刊第二期，頁一五五—一八一。

林萬億（一九九五）。影響臺灣民眾社會福利態度的因素，臺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二年二月定期調查報告，頁一七—四一，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傅立葉 (一九九四)。臺灣社會福利體系的階層化效果初探，一九九四年，伊慶春(主編)，臺灣民眾的社會意向：社會科學的分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彭懷真 (一九八三)。我國工業化與社會福利的演變(一九六三—一九八二)，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詹火生 (一九八七)。福利國家的經驗與借鏡——兼述我國發展社會福利制度的原則，中央日報國際版(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

Bachrach, Peter, and Baratz, Morton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947-52.

Bobo, Lawrence (1991).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ism, and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n *Social Forum*, Vol 6, No.1.

Carnoy, Martin (1984).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 Hou-sheng (1979).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13.

Deyo, Frederic C.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ldman, Stanley (1983).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1:3-29.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1980).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robel, Folker, Jurgen Heinrichs and Otto Kreye(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Gilder, George (1980). *Wealth and Poverty*, Basic Books.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aiwan Miracle*. NY: ME.Sharpe.

Gronbjerg, Kirsten, David Street and Gerald D. Suttles (1978). *Poverty and Social Chan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senfeld, Yeheskel and Jane A. Rafferty (1989).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Forces*, 67,1027-48

Hochman, Gilberto and John B. Williamson (1995). The Brazilian Public Pension System: Policy Changes, Political Effec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 48, 31-47.

Katz, Michael B. (1986).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K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3). Affirmative Action Attitudes: Effects of Self-Interest, Racial Affect, and Stratification Beliefs on Whites' Views, *Social Forces*,61,797-824.

K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 American 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NY: Aldine de Gruyter.
- Korpi, Walter and Michael Shalev (1980). Strikes,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Nations, 1900-1976,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301-34.
- Lin, Wan-I.(1991).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Welfare Effort in Post-War Taiwa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34, 171-190.
-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St. Martin's.
- O'Connor, James (1984). Accumulation Crisis. New York: Blackwell.
- Offe (1984). Claus.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Orloff, Ann Shola and Theda Skocpol (1984). Why Not Equal Protection? Explaining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ocial Spending in Britain, 1900-1911,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s-192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9: 726- 750.
- Pampel, Fred C. and Williamson, John B. (1989). Age, Class, Polit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1).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 London: NLB.
- Pratt, H.J. (1993). Gray Agendas: Interest Groups and Public Pension in Canada,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2). Protecting Mothers and Soldier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John D.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 Tsai, Wen-hui and Chang Ly-yun (1985). Politics, 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Social Welfare Legislation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ociology, 17:133-162.
- Wang, Fang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Clientelism in Taiwan, in Luis Roniger and Ayse GunesAyata (eds), Democracy, Clientelism and Civil Society 181-206. Lynne Rinner Publishers.
- Wilensky, Harold (1958).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ilensky, Harold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ijderveld, Anton (1986). "The Etho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4, 443-457.